

中国东北疆域研究

张碧波摇著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目摇摇录

关于东北民族与疆域研究的几点思考——代序	(员)
第一章摇摇关于中国疆域界定的研究	(员)
摇摇一、中国历史疆域诸说辨正——以东北疆域为例	(员)
摇摇二、中国历史疆域的界定与文献学、考古学的根据——以 东北民族与疆域为例	(圆)
第二章摇摇中国历代疆域观念、政策、类型研究	(缘)
摇摇一、中华疆域观念与历代边疆政策——以东北疆域为例...	(缘)
摇摇二、古代中国疆域类型研究——以东北疆域为例	(苑)
第三章摇摇中国东北古代海疆研究	(怨)
摇摇一、上古三代时期的东北海疆	(怨)
摇摇二、汉唐时期的东北海疆	(员)
摇摇三、辽金至清代的东北海疆	(员)
第四章摇摇箕子朝鲜——东北疆域史的开端	(员)
摇摇一、箕子朝鲜的政权性质	(员)
摇摇二、箕子朝鲜的疆域	(员)
摇摇三、卫氏朝鲜的疆域	(员)
第五章摇摇周秦时期对东北疆域的开拓	(员)
摇摇一、周朝与燕国	(员)
摇摇二、周朝时期的肃慎族	(员)
摇摇三、秦的统一与东北疆域	(员)
第六章摇摇汉唐时期的东北疆域	(员)

摇摇摇摇中国东北疆域研究

摇一、郡县辖区的内与外	(员袁苑)
摇二、南北分裂时期的中华疆域观	(员袁苑)
摇三、从郡县制到羁縻制	(员袁苑)
第七章摇高句丽疆域研究	(员袁苑)
摇一、民族归属与政权性质	(员袁苑)
摇二、高句丽的东部、南部疆域	(员袁苑)
摇三、高句丽的西部、北部疆域	(员袁苑)
第八章摇渤海疆域研究	(员袁苑)
摇一、靺鞨族的分化与重组	(员袁苑)
摇二、从旧国到上京	(员袁苑)
摇三、渤海靺鞨与黑水靺鞨	(员袁苑)
第九章摇辽金元对中国东北疆域的拓展	(员袁苑)
摇一、多元一体疆域观念的成熟	(员袁苑)
摇二、辽金元时期东北东部疆域	(员袁苑)
摇三、辽金元时期东北西部疆域	(员袁苑)
第十章摇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中国东北疆域	(员袁苑)
摇一、明清时期的中国东北疆域与文人地理 观念的大发展	(员袁苑)
摇二、沙俄对东北领土的掠夺	(员袁苑)
摇三、日帝对中国的侵略	(员袁苑)
结摇摇语	(员袁苑)
后摇摇记	(员袁苑)

关于东北民族与疆域研究的几点思考

——摇代摇序

摇摇长时期以来,我国学界,尤其是东北学界,在有关东北民族与疆域的研究上,一直处于被动的因应的地位,影响所及,我们的研究多停留在知识层面,多做微观的实证性研究,缺少宏观的综合性研究,理论层面十分薄弱,距离形成具有特点的学术体系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程。

在东北民族与疆域的研究上,我们处于多重包围之中。

日本学界先是把高句丽史、渤海史纳入到满洲史范畴之中,“企图从历史的角度证明日本帝国主义所扶持的傀儡满洲国存在的意义”。以后又主张渤海是高句丽的继承国,把渤海史纳入朝鲜史范畴。

俄国学界则提出“亚细亚中心主义”,把渤海史置于西伯利亚诸民族、诸种族的形成、发展史之中,把渤海看作远东诸种族历史上出现的他们自己的最初的国家,试图借此阐明远东诸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独立性。

朝鲜半岛的韩国与北朝鲜在高句丽与渤海的归属问题上观点是一致的(其间虽稍有差异,但实质是一致的),他们主张“(渤海的)血统本身和文化,是今天朝鲜民族血统和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之前存在于渤海地域内的高句丽的历史是朝鲜史不可缺的一部分,而高句丽人则是朝鲜民族”,“渤海是高句丽的继承国家”。他们主张朝鲜史是由“三国时代”到“新罗统一”到新

罗、渤海的“南北国时代”到“高丽的重新统一”。

我们正是处在这种学术政治化了的严重包围之中,这种学术政治化思潮的背后是国家疆域问题、领土问题。这种学术政治化了的“学术研究”,千人一腔,连篇累牍,咄咄逼人,使我们处于驳不胜驳的局面。

东北民族与疆域研究直接关乎对历史上与现实中的东北亚政治格局的认识,影响着东北亚的政治形势,所以它是学术的,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要掌握东北民族的基本历史联系

研究渤海史不能就渤海谈渤海,而应把渤海史放在唐史与东北史以及东北民族的基本历史联系中加以考察。研究渤海史应从靺鞨族史开始,甚至从高句丽史或者应追溯到东北史的开端期。

渤海是以粟末靺鞨为主体建立的中华地方区域政权,而靺鞨族很早就与高句丽发生了关系,直至参与朝鲜半岛的政治斗争——高句丽与百济、新罗的争霸,而粟末靺鞨在建国过程中有高句丽遗族的参与,建国之地又为高句丽之旧疆——所谓“复高丽之旧居,有夫余之遗俗”。两《唐书》又记渤海“本高丽别种”、“附高丽者”。凡此种种,为使渤海史研究产生误区提供了口实。

让我们来看靺鞨族史。据查,靺鞨族早在公元 4 世纪就与朝鲜半岛的新罗、百济、高句丽发生关系。

高丽史籍《三国史记·东明圣王纪》:“其地连靺鞨部落,恐侵盗为害,遂攘斥之,靺鞨畏服,不敢犯焉。”《太祖大王纪》六十九年(939 年):“肃慎来献紫狐裘,及白鹰、白马。”

“西川王十一年(939 年)冬十月,肃慎来侵,屠杀边民,……达买出奇掩击,拔檀卢城,杀酋长……”

勿吉国曾与高句丽发生过冲突:“去延兴中(936—937 年),遣

使乙力支朝献，……自云其国先破高句丽十落，密共百济谋从水道并力取高句丽……”(《魏书·勿吉传》)

据《三国史记》载：“祇摩尼师今十四年(员缘年)春正月，靺鞨大入北境，杀掠吏民。秋七月，又袭大岭栅，过于泥河。”“逸圣尼师今四年(员苑年)春二月，靺鞨入塞，烧长岭五栅。”“六年八月，靺鞨袭长岭。”“七年春二月，立栅长岭，以防靺鞨。”“九年秋七月，召群公议征靺鞨。”“奈解尼师今八年(圆猿年)冬十月，靺鞨犯境。”“奈勿尼师今四十年(猿缘年)秋八月，靺鞨侵北边。”以上均记靺鞨单独入侵新罗，至新罗慈悲麻立干十一年、高句丽长寿王五十六年(源愿年)“高句丽与靺鞨袭北边悉直城”。“秋九月，征何瑟罗人年十五以上筑城于泥河。”“(长寿王)以靺鞨兵一万，攻取新罗悉直州城。”从此，高句丽与靺鞨连兵，靺鞨就成了高句丽在朝鲜半岛争霸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

还在公元前 员世纪，即在百济始祖温祚王八年(前 员圆年)，《三国史记》记：“靺鞨贼三千来围慰礼城。”以后十八年、二十年、四十年，多婁王四年、七年、二十八年，仇首王三年、十六年，辰斯王三年等均记靺鞨入侵百济事。

靺鞨族之所以与新罗、百济发生领土之争，就因为新罗的溟州地连靺鞨。据《三国史记》卷 缘新罗太宗武烈王五年(远愿年)：“王以何瑟罗地连靺鞨，人不能安，罢京为州，置都督以镇之。”《三国史记》卷 猿地理志：“何瑟罗州，一云河西良，一云河西。”“溟州，本高句丽河西良(一作何瑟罗)，后属新罗。贾耽《古今郡国志》云：‘今新罗北界溟州，盖秽之古国，前史以夫余为秽地，盖误。善德王时为小京，置仕臣。太宗王五年，唐显庆三年，以何瑟罗地连靺鞨，罢京为州，置军主以镇之，景德王十六年改为溟州，今因之。’溟州即今半岛江原道之江陵。《三国史记》卷 员：‘南解次次雄十六年(员愿年)春二月，北溟人耕田，得秽王印，献之。’则此地区

乃古秽人之故地 ,后为靺鞨族之一支居于此地 ,南邻新罗、百济 ,北接高句丽 ,这种地缘政治关系决定了靺鞨族与高句丽、新罗、百济的敌对关系 ,而随着高句丽的日益强大 ,靺鞨族某些部族成为了高句丽的附属。据《隋书·靺鞨传》:“靺鞨 ,在高丽之北 ,邑落俱有酋长 ,不相总一。凡有七种 :其一号粟末部 ,与高丽相接 ,胜兵数千 ,多骁武 ,每寇高丽中。其二曰伯咄部 ,在粟末之北 ,胜兵七千。其三曰安车骨部 ,在伯咄东北。其四曰拂涅部 ,在伯咄东。其五曰号室部 ,在拂涅东。其六曰黑水部 ,在安车骨西北。其七曰白山部 ,在粟末东南。胜兵并不过三千 ,而黑水部尤为桀健。自拂涅以东 ,矢皆石镞 ,即古之肃慎氏也。”《旧唐书·靺鞨传》:“靺鞨 ,盖肃慎之地 ,后魏谓之勿吉 ,在京师东北六千余里。东至于海 ,西接突厥 ,南界高丽 ,北邻室韦。其国凡为数十部 ,各有酋帅 ,或附于高丽 ,或臣于突厥。而黑水靺鞨最处北方 ,尤称桀健 ,每恃其勇 ,恒为邻境之患。……其白山部 ,素附于高丽 ,因收平壤之后 ,部众多入中国。伯咄、安居骨、号室等部 ,亦因高丽破后奔散微弱 ,后无闻焉 ,纵有遗人 ,并为渤海编户。”

《新唐书·黑水靺鞨传》:“黑水靺鞨……离为数十部 ,酋各自治。其著者曰粟末部 ,居最南 ,抵太白山 ,亦曰徒太山 ,与高丽接 ,依粟末水以居 ,……粟末之东曰白山部。……白山本臣高丽 ,王师取平壤 ,其众多入唐 ,伯咄、安居骨等皆奔散 ,弥微无闻焉 ,遗人进入渤海。”

从上述史料可知 ,与高句丽发生关系(臣附) ,并与高句丽联合攻侵新罗、百济者 ,均为靺鞨族属之白山部 ,或者在朝鲜半岛江原道地区活动的靺鞨亦当为白山部靺鞨。而当唐朝征灭高句丽 ,与高句丽有关系的“伯咄部、安居骨部等皆奔散” ,而不及粟末靺鞨 ,是知粟末靺鞨与高句丽并未发生密切关系 ,而且一直处于敌对状态。

据《隋书·靺鞨传》：“炀帝初，与高丽战，频败其众，渠帅度地稽率其部来降。拜为右光禄大夫，居之柳城，与边人来往。悦中国风俗，请被冠带，帝嘉之，赐以锦绮而褒宠之。及辽东之役，度地稽率其徒以从，每有战功，赏赐优厚。”

《旧唐书·靺鞨传》：“有酋帅突地稽者，隋末率其部千余家内属，处之于营州，炀帝授突地稽金紫光禄大夫、辽西太守。武德初，遣间使朝贡，以其部落置燕州，仍以突地稽为总管。……子谨行，伟貌，武力绝人，麟德中（~~远源~~—~~远缘~~年），历迁营州都督。”

《新唐书·高丽传》乾封元年（~~远元~~年）唐征高句丽，“左监门将军李谨行殿而行”，李谨行参与征讨高句丽战役。

又查《新唐书·地理志》三：“幽州范阳郡，大都督府。……县九……幽都，本蓟县地。隋于营州之境汝罗故城置辽西郡，以处粟末靺鞨降人。武德元年曰燕州。”唐贾耽《郡国县道记》：“因粟末靺鞨首领突地稽当开皇中领部落归化，处之营州之界。炀帝八年为置辽西郡，以突地稽为太守理营州东二百里汝罗城……唐武德二年，改辽西郡为燕州，仍置总管。”此处所说的“粟末靺鞨降人”即指“渠帅度地稽率其部来降”者，则度地稽所率之部族为粟末靺鞨。度地稽，《旧唐书》作突地稽，唐武德初，“以其部落置燕州”。唐太宗时“以战功封蓍国公，……子谨行，……历迁营州都督，……封燕国公。”是知粟末靺鞨在隋末唐初臣服于中原王朝，并参加辽东之役，“每有战功”。隋《北蕃风俗记》：“初，开皇中，粟末靺鞨与高丽战，不胜，有厥稽部渠长突地稽者，率忽使来部、窟突始部、悦稽蒙部、越羽部、步护赖部、破奚部、步步括利部，凡八部，胜兵数千人，自扶余城西北举部向关内附，处之柳城。”（《太平寰宇记·河北道·燕州》）则乞乞仲象、乞四比羽乃在此八部之中了。据《靺鞨传》可知粟末靺鞨并未臣于高句丽，而且正是这些内附而居于营州的粟末靺鞨族众即为后来成立的震国——渤海国的主

体。

判断渤海主体民族的属性不是看它与其他民族族团的关系如何,不是看它所占据的疆域原属于哪个族团或国家,这均不应成为判定民族(或国家)归属的主要标志,更不是界定其疆域(属性)的条件。至于两《唐书》所记“高丽别种”、“附高丽者”则属材料来源问题,我们将在第二个问题中加以讨论。

我们认为应从民族学、民族文化学、考古文化学考察这个民族的族源;从政治地理学、历史地理学角度考察民族活动(生息繁衍)地区;从史学、文化史学、文化人类学角度考察民族文化特点与文化传统。在这种综合考察的基础上判断民族归属,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华民族观念。而渤海乃是以粟末靺鞨为主体建立的地方政权,自当在中华疆域范畴之内。就是高句丽族源于中华东夷古族高夷和夫余族、貊族,朱蒙之前的古句丽族活动于辽东郡东部与古朝鲜西部之间(桓仁五女山山城遗址一、二期遗物为古句丽文物,吉林通化万发拨子遗址跃进文化一期为先句丽文化,二、三、四期为古句丽文化),曾臣于周,后又附属于卫氏朝鲜。朱蒙在古句丽的基础上建高句丽国,为西汉之侯国,为中华古族所建的地方政权。公元 393 年迁都平壤(平壤在汉晋乐浪郡内),其政权性质、民族属性未变。王氏高丽史家金富轼在其《三国史记》中把高句丽纳入朝鲜史系列,制造了一个所谓的“三国时代”。但高句丽与百济、新罗属不同民族(百济、新罗属古韩族,不在中华民族范畴之内)、不同政权性质,高句丽并不因迁都平壤或因金富轼的《三国史记》就改变民族属性,就改变政权性质——它仍属中华民族范畴。

渤海占有高句丽之旧疆——即所谓“复高丽之旧居”,则属于疆域问题。我们认为疆域的界定有两个层面:一是凡属中华民族建立的政权及其疆域范围;一是中华古族虽未建立政权,却是“本

民族生息繁衍的边缘陆路领土或海洋领土”^①，地处边疆的中华古族虽未建立政权，却是这个地区的开发者与建设者，虽然中国的行政管辖未到达这里，但中华古族曾在这里开发，中华文化在这里生长发扬。如周秦及其以前的北亚地区，这个地区有古禺疆族、于夷、肃慎族、挹娄族、北濊族以及渤海、女真族的活动遗迹遗物。

后一民族集团或民族政权占有前一民族集团或民族政权的旧疆、旧土，这在中华历史以及世界史上所在多有，本不足为奇。这种历史现象是否像一些人所说是后者继承前者，后者是前者的“继承国”呢？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学术误区。匈奴族之占有月氏族的故地，鲜卑族之占有匈奴之故地，并不说明匈奴族成了月氏族之继承者，或者说鲜卑族成了匈奴族的继承者。作为于公元 28 年以粟末靺鞨族为主体建立的震国——渤海国，与公元 926 年灭亡的高句丽毫无关联，随着渤海国的日益壮大与发展，逐渐占有高句丽的旧疆（其时“高氏君长皆绝”已半个世纪之后），这是以大氏族团为首的渤海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渤海国的右姓首户高氏，则属于高句丽遗裔参与渤海国建设的民族共同体中的一员，它已不再以高句丽的后继者面目出现了。只是出于研究的需要，我们方在渤海民族共同体的构成及其来源时，方考察其成员的民族来源。除此之外，侈谈什么渤海为高句丽“系统的人”等等，是毫无意义的。中华疆域是一个历史的、相对的概念，在中华民族的多元统一体的历史形成过程中，中华疆域有一个消长、变动与形成过程，作为中国的整体的疆域应做如是观，作为地方政权也应做如是观。

我们认为在确定民族归属与疆域的界定上还有一个文化观

① 邢玉林《中国边疆学及其研究的若干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 年第 1 期。

念、文化传统问题。

确定某一民族的归属与疆域的界定应以该民族文化的渊源、民族文化特点及其所显示的文化传统进行全程判断,这是在中华民族观、中华疆域观统摄的基础上不可或缺的判断原则。由殷商遗裔箕子所建立的箕子朝鲜,其所施行的“八条之教”属殷商文化,并与土著文化结合,创造了东方君子国文化,成为中国东北地区古文明的开端。高句丽文化来源于颛顼高阳东夷高夷与夫余文化、貊族文化,它的卵生和河伯女郎族源文化、灵石崇拜文化、青铜短剑文化均来源于中华古文化,并融入中华文化传统之中。渤海文化是以中华古族勿吉——靺鞨文化为主体并吸收与接受唐文化和周边其他民族文化,形成有特色的渤海文化。这些均与朝鲜半岛南部三韩——新罗、百济以及后来的王氏高丽文化大异其趣。三韩——百济、新罗以及日本均在中华文化圈中,但我们并不因此而判定新罗、百济以及日本为中华疆域或归属中华。尽管它们受到中华文化的强烈影响,我们仍认为它们属域外民族,仍属域外政权。

根据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实际,根据中华疆域历史发展的实际,古代东北民族的基本历史联系就呈现在历史平面上了,我们就可以掌握这个民族发展的基本历史联系了——有了箕子朝鲜,方有卫氏朝鲜,方有汉四郡,后有高句丽迁都乐浪郡地平壤,后有渤海国占有高句丽之旧疆。这就是中世纪以前的东北民族的基本历史联系。马克思主义指出:“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为了真正获得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纠缠在许多细节或各种争执意见上面,为了用科学眼光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列宁《论国家》)我们研究中国东北古代民族与疆域,应该掌握东北民族的基本历史联系,并在“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的思想指导下进行,才可以突破包围

圈,打破一切学术误区,方有可能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东北民族学与东北疆域学。

对中外史料要有鉴别与分析

从事实出发,详细占有材料,从大量事实中形成观点,应是我们社会科学和历史科学工作者毕生遵循的原则。而在东北民族与疆域的研究中,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倾向。

在箕子朝鲜问题上,国际学界出现一种否定箕子朝鲜存在的虚无主义倾向。请看:

“箕子在朝鲜称王一事,从《史记·宋微子世家》的记载推之,当是殷后宋国的传说”,“箕子成为朝鲜王的传说,一般是不被人相信之事”。(〔日〕今西龙《箕子朝鲜传说考》,李健才译,《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员~~源年第 圆期)

“从前有些沾染事大主义的御用学者,无根据地捏造说,有个叫‘箕子’的外国人,率领几百名技术人员来到朝鲜,建立了国家。”(《关于古朝鲜历史》——摘自 ~~员~~源年版《朝鲜全史》卷 圆,李云铎译,《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员~~源年第 员期)“所谓‘箕子朝鲜’完全是捏造的,故将其弃之不谈。”(《古朝鲜历史概观》,《东北民族与疆域研究动态》~~圆~~年第 员期)

我们认为事实是历史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和根据,而观点、观念、原则则是研究的终结;我们的研究不应从主观的概念出发,“不能用范畴编排历史的顺序”,“不把它们封在硬结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阐明它们”(恩格斯《资本论》第 猿卷编者序)。否定箕子朝鲜是一个历史存在,原因在于对有关地上的与地下的资料采取主观的、盲目的任意取舍与解释,“将历史的事实宰割和剪裁得适合于它,那么唯物主义的方法就变成和它相反的东西了”(恩格斯《给保尔·爱因斯坦的信》)。

这些否定论者无视有关箕子与箕子朝鲜的史料,不能详尽地占有这些史料,从而在史料的分析与鉴别中,得出合于历史的逻辑的科学结论。因为箕子朝鲜是个历史存在,不容否定,也不可能否定。如果否定箕子朝鲜的存在,东北民族与疆域的基本体系就乱了套,东北古族古国的基本历史联系就断了线索,出现了空白。那些《古朝鲜历史概观》的作者们既不肯承认这个历史存在,又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空白,所以就提出所谓“后朝鲜”这个概念,特设“后朝鲜的成立与发展”一章,而其内容又全是箕子朝鲜的政治、经济、文化内容。藏头露尾,羞羞答答,矛盾百出。这种建立在主观空想上的历史观是不可能使学术走上科学道路,只能误导人民,欺骗社会。这是政治,不是学术,是学术政治化的必然恶果。朝鲜半岛学界这种否定论点正是基于他们所拼接的朝鲜史的发展序列,如果承认箕子朝鲜、卫氏朝鲜为古代中国的地方政权,那么,他们的所谓朝鲜史序列就不存在了,就不得不承认箕子朝鲜、卫氏朝鲜、高句丽、渤海等均与朝鲜史无关。

国内学界有人对箕子与箕子朝鲜提出“辽西”说与“逃亡”说。请看:

主张辽西论者的主要根据是辽宁喀左北洞村出土的殷商斐方鼎,这个方鼎内底铭文“𪚩侯亚鞞”。认定此𪚩侯即箕子,“𪚩侯亚鞞的𪚩侯为箕子的遗物”,并据此论定箕子最初在辽西建国(张博泉《箕子与朝鲜研究的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4~~1985年第1期)。这是主张箕子朝鲜在辽西的有代表性的论点。这涉及如何考释金文,如何对金文、甲骨文与文献史料的综合运用问题。查𪚩氏铜器传世总数约二百件,“上限约当商王武丁前后,下限可至西周康昭之际,表明这一族氏在商周历史上至少存在了三百年左右”(曹淑琴、殷玮璋《亚鞞铜器及其相关问题》,《中国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53页)。1985年,关于穆国

史研究又有新收获。刊发在《齐鲁学刊》~~1999~~年第~~猿~~期孙敬明的《两周金文与驂史新证》,《史学月刊》~~1999~~年第~~远~~期李宏、孙英明的《从周初青铜器看殷商遗民的流迁》。依据新出土新发现的驂侯器进一步印证驂侯为姜姓古国,并于商晚周初驂国一支或多支流迁北方辽西或内蒙哲盟地区,其青铜器的主要特征“主要在于对氏族徽号与日名共存延续使用上”。驂氏与殷商王室通婚,世代为殷商王朝的贞人卜史。可知,驂侯不是箕子。箕子为殷商王族,帝乙的族兄弟,殷纣帝辛之诸父,子姓。

驂侯自有其族史、国史,王献唐早已指出驂为姜姓,“为东方驂国特造的国名专字,在殷代卜辞金文里,并不用作其他意义”(《黄县驂器》,山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而把驂侯当作箕子,未能对史料做比较分析与鉴别,对驂侯器及其铭文未能结合文献史料做综合的、整体的考察,以致以讹传讹,误认其即箕子,在箕子朝鲜史上造成误区,长期以来,谬种流传,害人不浅。

在历史事实与史料的使用上存在一种“将历史的事实宰割和剪裁得适合于”自己的倾向,这种倾向甚至表现在对古文献的句读上。

有的论者在论及箕子朝鲜与燕国的关系时,为了说明他的“箕子朝鲜在辽东(按:指由辽西迁往辽东)”的观点的成立,竟在古文献的句读上做文章:

对《战国策·燕策》苏秦说燕文侯“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的“燕东有朝鲜、辽东”句,这位论者认为应句读为“朝鲜之辽东”。苏秦的东有、北有……是连用四对两两相对的排比句式,以说明燕之疆域,如句读为“朝鲜之辽东”,就把排比句式读成偏正词组,那么林胡、楼烦……也需改读为林胡之楼烦、云中之九原、呼沱之易水,这岂不是开玩笑么!

这位论者又说《盐铁论·伐功》的“度辽东而攻朝鲜”，应句读为“度辽而东攻朝鲜”。“度辽东”、“攻朝鲜”是由两个动宾词组组成连续动作的句子，辽东当时已在燕之辖区之内，而改读为“度辽（水）而东攻朝鲜”，这是破读，以附合己意。而且这样句读不仅不合原意，“而东攻朝鲜”的“东”字则成了衍文。

对《山海经·海内北经》“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列阳属燕”这一史料，这位论者句读为“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而对这条史料最后的短句，他认为“列阳属燕”，“与燕伐朝鲜前不符，此乃后人文字，误入正文，故不取”。（上引文俱见张博泉《箕子与朝鲜研究的问题》）

这条史料是记燕伐朝鲜之后箕子朝鲜的西部疆域问题。列阳即列水之阳，列水即今半岛的载宁江。《汉书·地理志》记“乐浪郡”有“列口”县，列口即列水——载宁江之入海口处。汉杨雄《方言》记“燕之外鄙，朝鲜冽水之间”为一方言区，冽水即列水。经燕人的打击，箕子朝鲜已退至列阳之东，海北指今黄海之北，山南为长白山之南。这条史料的最后一句“列阳属燕”不是“后人文字”之“误入正文”者，这一句是突出“朝鲜在列阳东”的疆域位置的指示，丢弃了这一句，整条史料就不完整、不明确了。

文献史料的分析、鉴别与使用，涉及研究者的方法论与工具论问题，从这个角度说，改变语型（句型、句式）以曲解语意，剪裁史料以适合己意，是以主观取代客观，改变事物内在的基本联系，必然造成对历史学的歪曲，造成研究误区。

在文献史料的处理上，还存在一种任意取舍、主观诠释的倾向。箕子“逃亡”说可为代表。

请看：“《汉书·地理志》：‘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显然，箕子在殷亡前即已出走。而《尚书大传》、《逸周书》、《史记》等书却都载有武王释箕子之囚。惟一合理的解释是，箕子被囚期间暗中

出逃，纣王没有公开此事，武王灭纣欲释箕子之囚，才发现并公开了这一秘密，同时宣布箕子无罪，故古书中释箕子之囚，一作‘原箕子之囚’。”并引“《吕氏春秋·慎大览》：‘武王胜殷，靖箕子之宫’注：‘以箕子避乱佯狂而奔，故清净其宫以异之也’”，以为“逃亡”说的佐证。

这位论者还以辽宁喀左北洞村出土窖藏殷周青铜器中的“奚侯亚鬲”器误“属(为)箕器”。“这一方面证明箕族曾至辽西；另一方面，箕器出于窖藏而非墓葬，说明箕族因匆忙离去……故窖藏以备日后归来时挖取……箕子自辽西迁朝鲜的原因很可能是担心受到纣王的进攻。纣王最终‘克东夷’之后，大军在东，以此北伐于囚禁中出逃的箕子或是以此为后遁勒令商在东北的方国擒箕子来献，是完全可能的。为躲避商纣王的加害，箕子不得不东迁朝鲜，进入东夷人的聚居区。”（杨军《箕子与古朝鲜》，《吉林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对这一段“逃亡”说的论述，可先不去分辨其正误，我们可从其对史料的使用上分析其研究方法与所显现的倾向。

这位论者的论析不是建立在详细占有史料以期把握事实的总和的科学基础上，他抛开《逸周书》、《尚书大传》、《史记》、《殷本纪》、《周本纪》、《宋微子世家》诸典籍所记武王胜殷之后处理殷遗及诸善后事宜和“乃命召公释箕子之囚”的全部史料，单单选择《吕氏春秋·慎大览》的高诱注、《汉书·地理志》的“殷道衰”，以及《史记·周本纪》的异文作为其“逃亡”说的根据。

《吕氏春秋·慎大览》：“武王胜殷……封比干之墓，靖箕子之宫，表商容之间，士过者趋，车过者下。”对“靖箕子之宫”，论者引高诱注“以箕子避乱，佯狂而奔，故清净其宫以异之也”，并以之作为箕子“逃亡”说的依据。

据查，《吕氏春秋·杂谓》：“比干、苾弘以此死，箕子、商容以